

中

华

锦

绣

顾绣

包燕丽 于颖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200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

华

锦

绣

顾 绣

包燕丽 于颖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顾绣/包燕丽,于颖著.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9.12

(中华锦绣/赵丰主编)

ISBN 978-7-81137-426-1

I. 顾… II. ①包…②于… III. 刺绣—简介—中国
IV. J5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0966 号



著 者	包燕丽 于 颖
责任编辑	史创新 周建国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 编	215021
电 话	0512-67258835 67258815(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640 mm × 960 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166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426-1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锦和绣是丝绸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的，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就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

2002年，苏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著《中国丝绸通史》，在一些丝绸老专家的提议下，总编辑吴培华邀我担任主编。此书在全国的丝绸历史专家及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于2005年正式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获得了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大奖。此后，苏州大学出版社又提出在《中国丝绸通史》的基础上再出一套简明而轻巧的普及版，于是，我们又策划、编写了这套“中华锦绣”丛书。

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至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分为十段，依照年代

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生产历史、传统工艺、主要种类、艺术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专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写成,前后分成若干辑陆续出版,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缂丝、吴地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顾绣、浙南夹缬。

“中华锦绣”丛书和《中国丝绸通史》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丝绸通史》的编写中,我们是以考古发现或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的;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注重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

在2008—2009年中,我们牵头将“中国蚕桑丝织技艺”成功地申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里的蚕桑丝织就是中华锦绣的同义词,就是中国纺织染绣的代表作,就是中国丝绸文明和纺织文化的象征物。由此,我们藉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建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目的。

赵 丰

2009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顾绣溯源 • 1

女红与顾绣 • 1

顾绣与晚明社会 • 16

第二章 顾绣名作与名家 • 29

顾绣早期名品赏读 • 29

韩希孟作品赏析 • 42

第三章 顾绣的艺术特色 • 68

顾绣绣本的来源 • 68

顾绣针法溯源 • 91

气韵生动的早期顾绣 • 100

风格多样的后期顾绣 • 113

顾绣的绣印 • 134

第四章 顾绣的继承和发展 • 143

顾绣对其他绣种的影响 • 14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顾绣 • 151

附 录 • 164

顾绣款识一览表 • 164

顾绣存世作品一览表(已发表) • 172

顾绣针法一览表 • 182

主要参考文献 • 189

后 记 • 191

第一章

顾

绣

溯

源

中国的刺绣工艺源远流长,是千百年来人们为装饰和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形成的一种手工艺术,与服装、室内装饰用料等关系密切。在刺绣艺术发展的漫长岁月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形成的不同的艺术风格,是辨识不同绣种的重要依据。明代晚期诞生于上海的顾绣,是一种纯艺术性的画绣,虽然借鉴了刺绣的方法,却与日用绣有本质的不同,是介于绘画与刺绣之间的一门艺术,直接受到中国画的影响。

女红与顾绣

顾绣是明代晚期出现的艺术性画绣,虽然从它诞生至衰亡仅百年左右,留存的作品也很少,但影响却极大。从历史角度看,顾绣的发生和发展绝不是孤立的,它是中国刺绣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吸取了中国画绣艺术的精华,在明代晚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独树一帜,异常芬芳,对后世刺绣艺术影响深远。

(一) 刺绣溯源

刺绣艺术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实物资料一直可以追述到商周时期。《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表明当时除用彩绘装饰服装以外,已经采用刺绣的方法来绣制纹样。瑞典马尔莫博物馆收藏的商代青铜觶上有黏附的菱形纹刺绣残片。陕西宝鸡茹家庄发现的西周时期刺绣印痕,可以清楚地看出是采

用锁绣的方法勾勒花卉轮廓,针脚均匀齐整,线条舒卷自如。据专家考证,周代的刺绣工艺已经比较发达,绣成的材料是像织成的布一样先制备好,再供使用的,可能已形成一定的规模。〔1〕

春秋时期,中国的绣品已经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5号墓中发现有我国公元前5世纪的绣品,那是一件凤纹鞞褙面,宽约43厘米,也是采用锁绣方法装饰,凤或栖于树上,或翔于树间,构图优美,线条流畅。〔2〕

战国时期,刺绣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贵族的服装,无不以刺绣为尊贵。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州马山战国中期一座等级相当于士的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一批绣品,共有21件,纹饰华丽,色彩鲜艳,十分罕见。这批绣品主要是衣衾及其他物件的面和缘,除一件是罗外,余均为绢。虽多为龙凤纹,但没有重样,有蟠龙飞凤纹、对凤对龙纹、龙凤相蟠纹、舞凤逐龙纹、舞凤飞龙纹、龙凤相搏纹、飞凤纹、凤鸟纹、凤鸟花卉纹、凤鸟践蛇纹等,变化多端,柔美典雅。最为精致的是一件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由红棕、棕、黄绿、土黄、桔红、黑、灰等色丝线绣成,色彩十分丰富(图1-1)。



图1-1 战国·龙凤虎纹绣罗单衣(局部)
(湖北荆州马山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1〕 李也贞等《有关西周丝织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2〕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所有绣品绣前先用墨(少量用朱红色)绘出图稿,绣时再作适当修正。绣线多为双股,均用锁绣,根据纹饰的要求,或用单行勾勒,或用多行铺排,覆盖绣地。绣品都是在成幅的织物上先绣好,再剪裁使用。〔1〕这座小墓出土绣品数量之多、纹饰之美、工艺之精,使人们充分领略了战国时期楚国刺绣的规模 and 魅力。

西汉时期,刺绣与织锦齐名,同被视为珍品。因织物的纹样受织造技术限制,而刺绣随意性强且艺术性高,故一般来说,刺绣比织锦更为贵重。此时,刺绣针法仍以锁绣为主,纹样则变成各种飞旋飘忽的云气。各地汉墓出土的刺绣实物较多,其中尤以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绣品最多也最具代表性。此墓出土绣品达40件,主要为衣服和衾被。所有绣品纹彩绚丽,用色达36种之多。自名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等;纹饰除云纹外,还有茱萸纹、棋纹、方格纹等。绣品主要采用锁绣,以层层相叠的方法表现纹饰。棋纹采用单针锁绣法,外观与“打子针”相似〔2〕;方格纹以烟色绢为地,用朱红、黑、烟三色平针满铺,绣成菱格填花的变体树纹,酷似“铺绒绣”〔3〕,体现了西汉时期绣法的创新。

东汉时期的刺绣实物多出土在新疆,基本针法仍是锁绣,但图案与西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多改变,以简化的植物纹如茱萸、蔓草、花卉等为主,另有一些动物纹,均较为写实。1959年新疆民丰出土的茱萸纹绣裤脚边,在绿色地帛上绣大团的卷云纹,其余部分为茱萸纹,用红、黄、白、青、蓝等色丝线绣制,虽只有一种针法,但因采用了镶边填色法表现所绣物体,所以纹饰还是十分醒目。〔4〕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

〔1〕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

〔2〕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图2-3-18,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同上,图2-3-19。

〔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图4-94,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版。

22 号墓出土的刺绣花边设计精美,呈锯齿状,采用锁绣针法,全部施绣。绣制者在每一平方厘米的三角形内,两两相对,分别用红、白和红、黄两色绣出一只只栩栩如生的水鸟,富有情趣;边框用绿、白、红、黄等色绣成,极具装饰效果。〔1〕

三国两晋时期,南方和北方地区刺绣的发展不甚平衡,采用的针法多为锁绣和劈绣,也有局部的串珠和钉金。据史书记载,北方由于统治者的禁绣政策,刺绣业不如南方发达。南方孙吴境内,妇人刺绣蔚为风气。王嘉《拾遗记》记载孙权的夫人赵氏曾绣制山川地势图,供军旅之需,“时人谓之针绝”〔2〕。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177 号墓出土的东晋瑞兽葡萄纹刺绣虽为残片,但仍可以看到大片图案。在黄色平纹绢地上,用蓝、棕、红、白、紫等色,绣出葡萄、茱萸、祥禽、瑞兽等纹样。葡萄及其他物体的边框部分用锁绣,中间的填色已采用平绣,纹样繁密而热烈。〔3〕新疆且末出土的汉晋时期墓葬中的鸟纹刺绣非常独特,在朱红色绢地上用单排或多排锁绣绣出色彩斑斓、装饰丰富的双头凤鸟,龙虎和花云环绕周边,极为富丽。〔4〕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刺绣佛像蔚然成风。史料记载,南齐陈夫人绣无量寿佛〔5〕;魏皇家寺院永宁寺内曾有珠绣像三尊,“冠绝当世”〔6〕。这一时期,由于制作大面积、高密度的作品费时费工,绣工开始尝试用表现效果基本一致的劈针来代替锁绣,大大提高了效率,是刺绣技法的一大进步。〔7〕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刺绣佛像残片,虽

〔1〕 常沙娜《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刺绣卷》,图 38,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2〕 王嘉《拾遗记》卷八,《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3〕 上海博物馆《丝路考古珍品》,图 59,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

〔4〕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图 3-3-18,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沈约《绣像赞》,《全梁书》卷三十。

〔6〕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7〕 关于劈针绣,请参阅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中《刺绣》一文。此针法未见他人提及,该为赵丰教授近年来的新发现。

然残留物不多,但根据现存物仍然可以看出此绣品居中为坐佛,左右是协侍菩萨。下面居中的是发愿文,两侧为供养人,从边上的题签可以看到,右侧尚存供养比丘和某王;左侧依次为师法智、广阳王母、妻普贤、息女僧赐、息女灯明。除边饰外,佛像、供养人、发愿文以及空余的底衬全部用细密的劈针绣成,有朱、黄、蓝、绿、紫等色,虽构图稚拙,且衣物的色彩缺乏过渡,但针脚整齐,排列有序,是一件用工很深的作品。绣品上供养人中间的发愿文残迹为“……十一年四月八日直勲广阳王慧安造”,可以推断其为信佛甚笃的广阳王元嘉,他于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在洛阳制作了该绣品,通过僧人带到敦煌供奉。〔1〕新疆昭苏波马出土的团窠花卉纹穿珠绣,在朱红色的地帛上,先用锁绣绣出忍冬纹和其他花草的底纹,其上再满钉珍珠;团窠和其中的四瓣花纹,则用金泡钉缀〔2〕,富丽堂皇,乃此时新法。

隋唐时期的刺绣以唐代的实物遗留较多。唐代宫廷贵妃院有绣工七百人,规模很大。除大量绣制花鸟画题材的日用品外,还绣制了很多佛像等宗教用品。绣法除沿用锁绣和劈针绣,还有很多创新,尤其是平绣的广泛应用,既提高了效率,又使色彩的变化和过渡成为可能。虽然丝织物中加金织绣早在东汉桓宽所著的《盐铁论》中就有“罽衣金缕”的记载,但真正能看到的实物,则成于唐代。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一批十分高档的丝织品,刺绣中就有一套保存得非常完好的蹙金绣衣服模型。这套衣物共有五件:大红罗地蹙金绣半臂、大红罗地蹙金绣裙、大红罗地蹙金绣褙、大红罗地蹙金绣袷袂、大红罗地蹙金绣拜垫。纹饰主要为朵云和莲花,全部采用蹙金绣,即在罗地上用金线盘出纹样再用红线钉牢(也就是以后的“盘金绣”或“钉金绣”),虽尺寸较小,但金碧辉煌,无与伦比。地宫中还出土了一件红

〔1〕 常沙娜《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刺绣卷》,图52说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图3-3-15,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罗地蹙金绣荷花残片,是用较细的金线十分密集地盘绕出物体的形状,呈块状,金线的用料非常多,绣制也十分费工。而这种金线越精细,其制备难度也就越大。出土的金线平均直径为0.1毫米,最细的仅为0.06毫米,即使用当今先进的工艺也很难达到如此水平,说明当时的金丝加工技术非常高超。地宫中还出土了很多压金彩绣残片(纹饰多为写生的莲花^[1]),即用金线或银线钉出纹饰的轮廓,再用平绣填满其中,这种实物在唐代早期的出土物中还未曾发现。甘肃敦煌和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平绣实物,更是刺绣工艺发展的标志。刺绣《灵鹫山释迦牟尼说法图》(图1-2),尺幅巨大,高241厘米,宽



图1-2 唐《灵鹫山释迦牟尼说法图》
(敦煌千佛洞出土,大英博物馆藏)

[1]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图4-3-55,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9.5 厘米,主要采用平绣层层叠加满绣而成,表现手臂的肉色用劈针绣。〔1〕佛教用途的刺绣另外还有披、带、褥、伞、幢、幡等,现在能看到的多数是一些残片。大英博物馆藏敦煌出土的百衲经巾,由三十余种织绣物拼合而成,其中的几块刺绣花卉纹残片采用抢针,花朵由红、粉红、黄、白、褐、紫、湖蓝、浅蓝、宝蓝、草绿、深绿等色层层退晕绣成。〔2〕这种绣法的实物在日本正仓院也有收藏,陕西扶风法门寺也有出土,说明此时用抢针绣花卉已经相当普遍。

晚唐至五代时期的存世绣品也以敦煌出土的为多,主要收藏于大英博物馆。这一时期的绣品沿袭了唐代的风格,并不断尝试用新的针法来丰富平绣的表现力。花卉多采用齐针、抢针、掺针绣成〔3〕,有些在边框部位用钉线或钉金绣勾边。另外,1957 年苏州虎丘灵岩寺塔第二层塔心窟出土的五代紫绛绢刺绣宝相睡莲经帙残件〔4〕(图 1-3),中心绣一大朵正面莲花,金黄色的花瓣用抢针;浅褐、深褐的花蕾用接针勾勒轮廓,用齐针及斜缠针填绣,最外圈的花蕾已经采用借地绣法;叶边及细枝用接针。

辽宋时期,刺绣正式分成实用绣和艺术绣两大门类。针法已经从早期的锁绣和劈针绣过渡到了以平绣为主,并顺应当时绘画流行的写实风格,以清新动人的自然景物和人物题材入绣,如花鸟图、莲塘图、婴戏图等。蹙金绣继续沿用,并逐步发展出钉金绣、盘金绣、蹙金彩绣和彩绣压金等门类,这些针法尤其是在辽金的刺绣中被广泛应用。另有一种贴绣很特别,就是在底料上铺上另外一种面料剪成的花样,用钉线绣等绣法压边。

〔1〕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图 182,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2〕 同〔1〕,图 79。

〔3〕 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图 185—194,华东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4〕 常沙娜《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刺绣卷》,图 69,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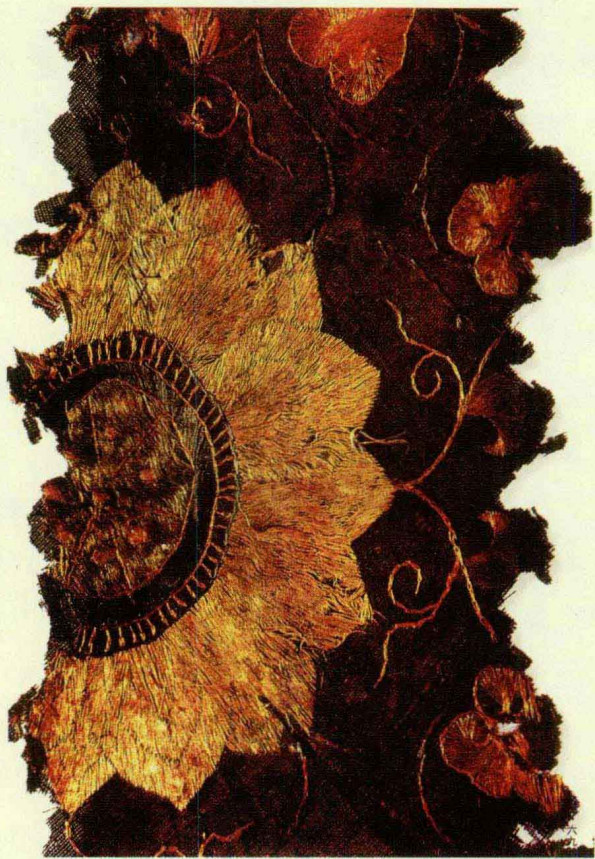


图 1-3 五代·紫绛绢刺绣宝相睡莲经帙(局部)
(苏州虎丘塔出土,苏州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些衣物上的刺绣,可以反映实用绣的情况。北京故宫收藏的 20 世纪 50 年代山西等地辽墓出土的刺绣,图案新颖、生动、写实,多为平绣制品^{〔1〕};内蒙古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辽代早期绣品多采用主体平绣再用钉金线勾勒边框的压金彩绣方法^{〔2〕};福建黄升墓出土的南宋时期衣物上的刺绣采用帖绣压边的方法,边框或

〔1〕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图 7-2—7-11,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 年版。

〔2〕 同〔1〕,图 7-16—7-18。

用钉线绣,或用锁绣,形式多样^[1]。黑龙江阿城金墓出土的罗地绣花女鞋^[2],先用片金剪出萱草花纹,再用细线钉在罗地上。西夏时期的刺绣实物以黑水城出土的“刺绣唐卡空行母”^[3](现藏俄罗斯圣彼德堡艾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为代表,仍然用锁绣或劈针绣针法勾勒器物的轮廓,在主体人物形象需要满绣的部位应用了平绣。

由于花鸟画成为当时绘画的主要题材,写生风格的花鸟类绣作也相应出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宋绣梅竹鹦鹇》《宋绣海棠双鸟》就是这类绣品中的杰作。辽代墓葬中也有精品出土,如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的红罗地梅竹蜂蝶纹绣(图1-4)和蓝罗地梅花蜂蝶纹绣^[4],画面清朗,采用平绣方法,接针和滚针绣出枝干与经脉,齐针和掺针绣出块状的花、叶、竹、飞蝶及山石等,疏密随需而施;再叠绣花蕾、小花、竹



图1-4 辽·红罗地梅竹蜂蝶纹绣(局部)
(内蒙古庆州白塔出土,巴林右旗博物馆藏)

[1] 常沙娜《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织绣服饰全集·刺绣卷》,图88、图89,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2] 赵丰《中国丝绸通史》,图5-3-56,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图7-44,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版。

[4] 同[2],图5-4-56。

节等。红罗地梅竹蜂蝶纹绣色彩丰富,有白、淡黄、粉红、红、紫、湖蓝、深蓝、淡绿、草绿、深蓝等十余种颜色,搭配协调,虽山石等部位还是以色块拼合为主,但已开始晕色的尝试,比前朝有了很大的进步。蓝罗地梅花蜂蝶纹绣图案与前者大同小异,但设色淡雅,仅用白、黄、橘黄、草绿、深蓝等几种素色表现,与蓝底相配,格外清爽。此时的刺绣已经渐入画境,可以说已从日用绣中脱胎,成为画绣。

元代刺绣承袭了宋代的绣法,日用绣应用的面更加宽广,出土物中,以内蒙古集宁路故城窖藏所出罗地花鸟纹刺绣夹衫(图1-5)最为精美。此衫平绣大小图案几十组,有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等,十分丰富,两组大的图案均为莲塘小景。绣法除平针外,还有抢针、锁绣、刻鳞针、打子针等,专家认为“与苏绣颇为相近”〔1〕。从各地出土的



图1-5 元·罗地花鸟纹刺绣夹衫(局部)
(内蒙古集宁路遗址出土,内蒙古博物馆藏)

〔1〕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图7-192 著者说明,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年版。